
雅典的衰败——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背后的原因

摘要

雅典衰败的原因除却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决策失误和天灾人祸之外，还有一些细节。雅典固有的扩张战略为雅典带来了更多的敌人；雅典并不完善的民主政治在战时无法调节矛盾、或者说使得矛盾加剧，最终消亡。这些内容在我看来更像是雅典战败的必然之因。

引言

雅典是古希腊文明中难以忽视的瑰宝，当我们讨论古希腊时，不时会将雅典放诸一个中心的位置，关注其动向一窥古希腊文明。然而，这个以其民主政治、哲学智慧、艺术文学创作而让我们于后世惊叹的伟大城邦，却在她最强盛、辉煌的时刻迅速的衰败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瑰丽的古希腊文明的退出舞台。这样结局实在是值得探究。本文将尝试讨论伯罗奔尼撒战场中失利背后的原因，以研究雅典衰败的真正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扩张主义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几次大的失败可以归结为军事上的失败，这是具体的失策。但是除却军事决定上的问题，战争的发生和战局势力的不断不利于雅典，可以说是雅典自身的行为所致，甚至是一种基于雅典扩张方针之下预设的结果才对。雅典是否早有防备不得而知，但的确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雅典的自我膨胀和野心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可见的雅典衰败的直接原因。在与以其宿敌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战争中，雅典的战败直接引发了这个城邦的地位崩塌。而这场战争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雅典的强盛继承于希波战争，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号召希腊城邦共同抵御外敌波斯，在唇亡齿寒的危机下，希腊人共同抵御强大的波斯，甚至在波斯引以为傲的海战当中，战胜了它。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在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雅典地位的水涨船高。雅典在希波战争期间凭借其威信，集结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组建了提洛联盟。“雅典则逐渐夺取它的同盟国的海军（只有开俄斯和列斯堡是例外），要求它的同盟

国缴纳公款。因此，在这次战争中，单读雅典一国所能应用的军队比同盟全盛时期的同门军的总数还要多些。”ⁱ

然而，雅典的野心不仅限于此。在击退波斯人后，雅典已然建立起海上霸权，城邦的军事势力大为增强，而当雅典人返回故土准备重建城市，并且建立要塞的时候，他的同盟国们面对此时的雅典产生了恐慌。斯巴达曾受同门过怂恿派遣使团来到雅典。“不但雅典不要僭主亚塞，并且雅典应当和他们联合一起来摧毁伯罗奔尼撒意外险村的一切要塞。”ⁱⁱ然而，此时实力已然叫盟国忌惮的雅典，并未为巩固同盟放弃建立要塞的计划。雅典人依照米斯托克利的建议，假意派人谈判，却不断拖延谈判至要塞和城墙建立到足够的高度。

在后续战争中，由于斯巴达所出的希腊联军总司令波桑尼阿斯的专制行为，以及雅典人出于自身利益的推波助澜，波桑尼阿斯被召回审问，而雅典进一步夺取了联军的领导权，进而逐步主导了提洛同盟。不仅如此，在未来，雅典还不断延伸它的城墙，并不断的干涉同盟国的自由权利，引发伊庇丹努争端，插手科林斯和科西拉之间的战争，并且由此引发了波提狄亚争端，违反同盟的协议。雅典的野心昭然若揭。

故而这引发了一干同盟国的警觉，斯巴达及一干城邦建立起伯罗奔尼撒同盟，打响这场战争。

（二）对外霸权行为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利，有很大的原因在于它对待同盟国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时而有盟国叛离雅典同盟而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的同盟国在承担战争的义务的同时，还必须上交财资作为联盟的财政拨款。而这个资金库由雅典人主导。这也是雅典后基本篡夺整个联盟的主权的引子，甚至将本放诸提洛岛的资金库（也就是提洛同盟的标志）迁至雅典城。ⁱⁱⁱ

而提洛联盟建立之初，要求各国平等地以盟国的身份参加同盟会议，进行联军事务的决议。然而这个各国中包含了雅典么？修昔底德记述道：“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同盟者各国起初是独立的，并在（他们的）公共议事会中议决。”^{iv}这个记述十分有趣，同盟议事会的平等召开确是在雅典的领导下进行的，雅典在同盟中的地位似乎超然于其他城邦。事实也的确如此，雅典人在决议中甚至也可对同盟会议的决议做否定，而会议是否召开也是由雅典人说了算的。^v

雅典之于盟国的霸权地位，并不局限于这种领导地位。雅典既得同盟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充作军费的各国资金（雅典甚至并未上交）又是如何利用的？军费被雅典用以维持城邦的基本运转，不仅是军队，国内的官员也靠这笔钱供养，而整个城邦的粮食供给也来自军费。“人民采取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国十分专横，只有开俄斯、列斯堡和萨默斯例外，他们吧这些国家当作霸国的钱少，允许他们包邮自己的政府并通知他们已归它们的属地。他们又爱找阿里斯忒得斯的及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税、征税、和盟国捐款的综合，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而生活。”^{vi}

雅典对待同盟国的态度已然不是领导，更罔论平等，甚至是一种奴役。这种奴役不仅是经济上的，事实上同盟内的大多数纷争，都是雅典采取一种武力干涉的结果。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实质上成为了战争中雅典借以扩张的道具，就像雅典人压榨其奴隶以获得的繁荣一样。这种隐藏在奴隶制下的霸权，只是在这一次遇到了反抗，盟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不断的叛敌不可谓不是雅典咎由自取。

民主政治的问题

诚然，当我们去探讨雅典衰败的原因，伯罗奔尼撒战局的失利的确是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当斯巴达人集结波斯人将满心雄图霸略的雅典人在战局中挫伤得节节败退得时候，雅典这个希腊大地上曾经的巨人的身影便已经不断被曝光出了那日益颓唐的脊背，甚至当雅典派出使臣像斯巴达俯首称臣的时候，这个骄傲的城邦可能已经不再拥有再度崛起的格局和锐意了。

然而，正面战场的失利或许不是雅典衰败的全部面貌，这张被斯巴达的铁蹄和战浆蹂躏的悲容背面，应该还有一张此时已被拂去光彩面纱的、民主政治的凄然面貌。也许在雅典的民主制消亡的那一刻，这个城邦也已经无所谓“雅典”。

（一）和平背后的矛盾

雅典的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追溯到梭伦改革。大家无一例外地肯定了梭伦改革推动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发展。然而，梭伦地核心政治思想是中庸，是一种对各方势力的权衡。

当雅典的商品经济逐步发展起步时，激增的贫富差异使得平民背负了由贵族施放的巨额债务。“借款是以人身为担保的，而土地则集中在少数所有者的手里。”^{vii}债务的终点甚至将是平民将会沦为奴隶，而法律则在维护债务关系的同时，使得这种贫富差异无法被逾越，于是平民和贵族的阶层矛盾在当时的环境下难以调和。

而在各个党派为此争斗不断时，梭伦因他的门第和名誉被选为这场党争得调和者。梭伦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劳永逸地解放了人民，并取消了公私债务，将由于债务无法维持的农民解救于水火。^{viii}但是，并未如平民所愿的是，梭伦并未将土地重新分配，甚至对人们购买土地的数量进行了限制。雅典人虽不再要面对沦为奴隶的风险，但是却并未获得更多的权力（土地的限制）。^{ix}

同时梭伦赋予了平民监督和选举官员的权利。根据公民的财产等级，公民将会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并担任相应的官职并获得相应的待遇。同时，梭伦还设置了四百人议会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而正如前文所说，梭伦的和新措施是一种对实力的重新平衡。的确，梭伦将农民从贵族的重负中解救出来，但是却并未改变民众和贵族之间的权力悬殊，由财产分级的官职分配制度使贵族始终占据雅典社会的高层。这就使得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被解决。梭伦因过分中庸的改革使得自己不被矛盾双方支持所以选择了离开。而遗留的改革一度瘫痪，党争继续之下使得雅典的政制几乎瘫痪。后来山地派（平民派系）政变，却带来了数十年的僭主独裁。后克里斯蒂尼又推翻僭主再次推进民主改革。

（二）雅典民主面临的问题

由上文可知，雅典内部的阶层矛盾是固有的，甚至说雅典的民主政治，就是为了权衡这种矛盾而存在并不断发展下去的。

可是这样的民主最终的终点是什么呢？梭伦改革未能改变平民和贵族的实际权力差别，所以也就无法消除这种公民内部的冲突。于是，后来继承的人民代表就不断地将权利平均地配给给公民。当发展到伯里克利时期（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年代），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黄金时期，公民完全成为了政府的管理者，抽签担任官职。然而，这种泛民主使得公民无法根据能力获得合适的地位和社会职务。伯里克利制定了陪审法庭给薪的制度后，陪审法庭开始败坏，普通的人相比德性高尚的人更加注重这个官职的抽签，利益面前德行和财产的区别更加明显。而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贿赂法庭的事件也发生了。（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 XXVII 32）民主政治的过分民主使得公民虽然掌握了政府的掌管权，但是却无法保证政府的运作符合一个基本的正义和相对的正确，这是一种方向上的偏移。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还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

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x雅典的民主究其根本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由少数公民掌握话语权的强权政治。而当政府不具备基本的公正标准和明确的判断准则时，雅典民主的不理智和趋利性就会逐渐显露。

（三）战争时期雅典内部的混乱

在伯里克利死后，人民首次选择了出身高尚阶层但是并不具备良好声誉的人作为领袖。这是大不同于之前的雅典民主政治走向的，几乎所有的人民领袖都取信于民，梭伦、克里斯蒂尼、伯里克利皆是如此。而这种人民领袖的选择，在之后的雅典甚至趋向于一脉相承的鲁莽，而这些领袖则迎合大多数人以获得声望。^{xi}

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此时由于局势尚好的战局，并未大乱。当西西里的战败发生后，战争的失利使得雅典内部人心惶惶。这种局势之前就已经发生过，适逢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入亚狄迦，雅典人同时面对战乱和瘟疫的压力，也曾出现锅大规模的混乱。此时伯里克利仍是人民领袖，人民便将怒火和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施加到了伯里克利身上。伯里克利尽力平息人民的怒火却只是让人们同意了他的国家政策，并不再像斯巴达派出求和使团（虽然受挫），但是恶评仍然未被消除，人民对伯里克利仍进行了罚款处罚，才满足。^{xii}这种行为无疑是有一些可笑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甚至对此评价“人民一向如此”。

但这种混乱发生时，伯里克利因其出色的能力和品行在之后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再次担任将军，而公民们也终于又专注于统一的目标，战争的胜利；可是当领袖不再是像伯里克利这样优秀的人时，城邦内部的混乱局面就显得一发不可收拾。雅典的民主政治先是被废弃，而成立起了四百人政府，而公民大会通过此决议的原因是当他们对自身的宪法做出限制是，波斯王国就会转而帮助自身。^{xiii}寡头政治在被驱逐百年后于雅典粉墨登场，而这项计划实际上却又是由高贵阶级的人推动，四百人议会实际上掌握实权统治国家。后四百人议会推翻，权利交付给掌握军籍的五千人，而后这五千人又被剥离权利，“三十僭主“上台。”三十僭主“为自身利益将兼具财产、门第、声望的人处死以获取更安稳的地位，并假意迎合民众不断操纵政治和任职，最终甚至强迫议事会通过法令以驱除异己。这种政权的频繁更替，并在”三十僭主“时期伴随着大量血腥阴暗的清洗，这使得雅典此时甚至难以处理城邦内部的混乱，更罔论在战争中取得什么好的进展。

（四）雅典民主政治的病结

正如前面所叙述的，雅典民主政治一直没有很好的处理阶层之间的矛盾，这才使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内部出现了这些问题。

但是这种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未被处理好，反倒是更像是终将爆发的隐疾。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初，这种措施的出现就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社会矛盾。最初的对象是贵族和公民之间的，贵族掌握丰富的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而农民不具备土地和实权，于是最终甚至难以维持生存将沦为奴隶。民主政治的诞生就是为了消解这种矛盾，或者说软化这种矛盾，因为依照前文所说的，平民只是不再会面对过于严酷的风险却不至于拥有丰盈的财产。而古希腊时期，利益方并不仅限于贵族和平民，早在梭伦时期，党争就是在“平原派”（拥有土地的贵族）、“山地派”（不拥有土地的农民）、“海洋派”（手工业和商业从业者）三方间发生的，只不过海洋派态度温和且矛盾不至于另外两派那么激烈罢了。但是这交代了古希腊生产关系的第三方，手工业和商业从业者。

可以说，雅典的民主政治的方向，是将生产资料重新分配，并给予所有公民地位的保障以获得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但是这种地位的保障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公民实际上的收入来自于土地、房产、和奴隶。雅典民主制度竭尽全力实现的是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在战时尽义务，但是却从根本上不对公民从事生产做出要求。^{xiv} 奴隶的劳作为公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但是奴隶和外邦人由于并不拥有土地所以更趋向于加入手工业和经商，因而，非公民自由人在工商业中占有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而这些人也拥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xv} 而当战时，公民开始面对财产的缩水。“人民财产在过去就是很少的，现在连这一点也被剥夺了，富有的阶级丧失了他们美好的地产和乡村中富丽堂皇、设备优良的房屋；而最坏的是，他们生活于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xvi} 社会的财富在非公民身上集结，而公民却变得贫穷，甚至普通人无法负担得起奴隶的使用，穷人家庭“牛就是他们的奴隶”，而反观拥有技术的奴隶，甚至能够拥有相对更好的生活，更罔论一些外邦人。

雅典民主制的基石（公民的生活和地位的保障）在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已然变得支离破碎，而专注于公民政治参与，将生产的主体交由奴隶的行为，或许无法避免地将会迎来贫富差距再次被拉大地一天，这种缺陷是深植于雅典这种奴隶制和民主制的融合中的。而这种根基式的动摇才使得战争成为必然，雅典需要一个新的压榨对象以维持城邦内部公民的生活保障，这个对象既是盟国也是敌国；然而令雅典意外的是，他们小瞧或者忽视了这种社会矛盾带来的病患，在战争时期本就发展举步维艰的雅典民主制突然失去了自我调整的空间，最终

消亡。

总结

综全文所叙，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是击垮雅典的直接原因，但是这场战争的失败，却不全然是军事层面上的。我们可以发现，结局一定程度上是写在雅典的骨骼之中的，最基本的奴隶制使得它选择了扩张的战略意图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激起并不断恶化战争的局势；而其民主制的内部问题和矛盾一方面又要求了这种扩张主义的实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自我完善和调节，整个民主政治在战争期间走向了衰亡，这也加剧了雅典的社会问题，战败几近必然。雅典的衰败过后，斯巴达战胜却元气大伤，希腊未能眷顾斯巴达再次易主并最终结果于马其顿帝国。雅典的衰败，最终引发了连锁反应，使希腊走向了被征服吞并的结局。

参考文献

- ⁱ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16页，（谢德风译，商务印刷馆，1985年）
- ⁱⁱ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七章，64页，（谢德风译，商务印刷馆，1985年）
- ⁱⁱⁱ 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三期，102页
- ^{iv} 修昔底德，I，97，1；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XI，47
- ^v 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三期，103-104页
- ^{vi}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V，29页（日知 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 ^{vii}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IV，8页（日知 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 ^{viii}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VI，9页（日知 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 ^{ix} 张建军：《正义与政体-古希腊雅典正义观探研》，21页
- ^x 顾准：《顾准文集[M]》，68页（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
- ^{xi}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33-34页（日知 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 ^{xii}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p150，（谢德风译，商务印刷馆，1985年）
- ^{xiii}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34-35页（日知 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 ^{xiv} 张建军：《正义与政体-古希腊雅典正义观探研》，35页
- ^{xv} 徐松岩：《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五期，84页
- ^{xvi}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149页，（谢德风译，商务印刷馆，1985年）